

历史使命的终结?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思考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

柏 棣

(美国德儒大学, 美国 新泽西 07940)

(摘要) 21世纪是“危机”的时代。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解释过程中,各种理论思潮都要面对本身同危机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就是其本身同资本运作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女性主义也是如此。这样,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就构成了21世纪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女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其批判目标是残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父权制。随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建立,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历史使命基本完结。

(关键词) 女性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性别; 女权运动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4)01-0001-06

Is It the End of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Capitalism in the Capitalist Crisis

BAI Di

(Drew University, New Jersey 07940, America)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age of “crisi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isis and those ideological trends are needed to be considered when they are compared with crisis, more precisely,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between crisis and capital operation, or capitalism.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capitalism constitute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topics in the 21st century. Feminism is the outcome of capitalism. The objective of feminism to criticize is patriarchy, which remains in the new capital societ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tur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feminism has been finished generally.

Key words: feminism; capitalism; social gender; feminist movement

21世纪是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到来的。西方舆论很喜欢“危机”这个中文词,说它充

满了辩证法,“危”险中包含着“机”遇,坏事变好事!的确,对资本而言,每一次危机都是新一轮

收稿日期: 2014-01-10

作者简介: 柏棣,女,美国德儒大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

资本积累、财富集中的绝好机遇;对广大劳动者来说,每一次危机都预告着新一轮的被剥夺的危险。然而,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这次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大爆发,的确为其带来了一个自我认识的契机。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解释过程中,各种理论思潮都要面对其本身与危机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就是本身与资本运作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女性主义也是如此。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就构成了21世纪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女性主义是很难规范和定义的,因为它是缺乏统一理论根源基础的社会思潮。女性主义理论可能是讨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也可能是纯粹的形而上的。女性主义立场的范围也很大,从保守到激进,从原教旨的到无神论、无政府的,五花八门。女性主义是一种松散的运动,其诉求不断改变。为了说清楚问题,本文所指的女性主义是指以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经验为主,英国、法国为附属的横穿20世纪的社会性别政治理论。这种从中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视角看待社会政治的理论对中国有两次影响: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围绕着“娜拉出走”而展开的女权运动;第二次影响更为深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女性主义成为而且一直作为中国妇女研究的主要思想理论资源和动力。

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含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是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般性认识,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第二层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自我定位。关于第一层,可以参考201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本主义,支持和反对:一场女性主义的辩论》(*Capitalism, for and Against: a Feminist Debate*)一书。书中清楚地记录了当下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代表支持一方的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安·卡德(Ann Cudd)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从实践上和理想上都更有利于女人。资本主义的功绩之一是打碎了父权制,解放了女性。虽然资本主义有不足之处,但是总体上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得以普及,当然资本主义提倡自由,如言论自由,性自由等,使女人的个性也得以发挥。这里,卡德很明显地应和美国自由派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形式。对于卡德来说,资本主义对女人来说是最好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之一,因此,女人不需要未来,女人的历史也终结了。

站在这种经典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立面的是任教于美国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的南茜·霍姆斯特罗姆(Nancy Holmstrom)教授。她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正能量,指出资本主义相对于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贫富差距巨大,劳动者跟自己生产的产品的绝对脱离而导致的严重异化和环境污染等,对于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抽象的女人。而且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甚至不同年龄的女人的生活状况区别巨大,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资本主义没有完全打碎父权制,而是利用父权的意识形态,使女人的生活状态整体上不如男性。但是,霍姆斯特罗姆也认为存在着一个理想形式的资本主义,比如福特主义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对资本不能放任自由,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

正是考虑到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问题,笔者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女性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文章里,把女性主义分为左右两个阵营:右翼支持资本主义,强调在制度内“多分蛋糕”,是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笔者称之为“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左翼是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公正女性主义”,其着眼点是社会生产劳动的价值报偿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1]。对女性主义派别的传统区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已在21世纪失去了其根

基 因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女性主义的定语经历了多元化的理论解构,已经面目全非了。另一个问题是命名上的错误,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笔者将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详细论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不存在的)。

女性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第二层含义是建立在霍姆斯特罗姆的逻辑上的。女性主义左翼在资本主义危机的 21 世纪察觉到女性主义的初衷和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取得的实践成果,最后被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利用去剥削世界。他们原以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有力批判,却发现其结果不但没有削弱资本主义制度,反而使其更有生命力。那么“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跟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左翼必须面对的问题了。可以说,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了女性主义左翼的身份危机。

这篇文章记录的是笔者近几年对女性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一些结构性思考。文章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主要介绍女性主义左翼反思的几部影响比较大的著作,使读者对这个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部分是笔者对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

对于南茜·佛里泽(Nancy Fraser)国内从事妇女研究的同行们应该不会陌生,这位纽约新学院的教授是女性主义左翼的一个重要人物,纽约新学院是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的学术重镇。2009年3月,佛里泽在《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诈》(*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其对女性主义特别是第二波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检讨。她纲领性地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女性主义的孵化器,女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女性主义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协调自身的诉求。比如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第二波的女性主义通过对制度的批判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第二波的“社会关怀”精神逐渐被“个人追求”所替代,而极端个人化正是新自由主

义的核心,女性主义被资本利用,成了制度的“侍女”。第二波女性主义曾经集中火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在呢?女性主义的中心议题变成了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幸福。第二波女性主义曾经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弱肉强食”鼓励人们升官发财的竞争,而现在呢?女性主义在热切地推崇“打破玻璃天花板”使女性变成人上人。第二波女性主义曾经把团结一致的集体精神作为旗帜,而现在呢?女性主义鼓励女人做出人上人的企业家。第二波女性主义曾经的互相关怀互相依存,变成了现在的个人实现和个人奋斗。

最近,佛里泽又在英国《卫报》上发文,重述她的焦虑“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一直都认为争取妇女解放是在从事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加平等、公正和自由的世界的伟大事业。但是近来我已经开始担心,这些女性主义的理想会被利用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目的。我尤其担心的是,我们对性别歧视的批判,现在正在为以新形式出现的不平等和剥削提供理由。”^[2]

左翼思想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海丝特·爱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如果说佛里泽是从理论上思考女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爱森斯坦更多的是从公共政策和参政等实践角度考虑问题,而且有比较明确的阶级视角,这些跟她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任教的爱森斯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弃文从政”,去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做妇女政策参议。在政府工作期间,她亲身经历和感受了女性主义被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用为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削减政策服务。她的《被诱惑了的女性主义:全球的精英是如何利用女性的劳动和思想去剥削世界的?》(*Feminism Seduced: How Global Elites Use Women's Labor and Ideas to Explore the World?*) 在欧美女性主义学界影响很大,2010、2011 连续两年,《左派论坛》组织了有关这本书的专门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

2009 年出版的这本书用很直白的语言罗列了大量事实,揭示了女性主义无力对抗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两种主要社会权利:国家资本和国际资本。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女性主义甚至跟国家

资本和国际资本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流合污。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在销售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和其他精英们试图系统地勾引女人拥抱资本主义的扩张。

《被诱惑了的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角色的重新诠释有开拓性意义,爱森斯坦展示了统治精英阶级如何利用妇女的劳动和妇女解放思想以及妇女自我赋权思想来维持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她书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女性主义推崇自我赋权而导致美国社会福利的取消;国际资本通过在第三世界建立出口区剥削第三世界妇女以满足西方妇女的消费;女性主义把世界银行高利息的小额信贷说成是南半球妇女赋权的途径;利用西方所谓妇女的解放作为布什发动所谓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借口等等。爱森斯坦提醒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和行动主义者,国际女权主义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她认为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积极加入进步力量,寻求一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她的号召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资本主义“没有替代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是新自由主义急先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名言,而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寻找替代物。

第二波女性主义最为自豪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性暴力”“家庭暴力”“亲密关系内的暴力”等概念。女性主义首先通过社会运动促成社会全体成员对这些概念的承认,各种政府机构和企业社会团体建立了反对性骚扰的章程,建立了性暴力受害者避难所等等。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成功地游说美国各级政府,把家庭暴力作为刑事犯罪(注意,不是民事纠纷)制定刑法立法。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女性暴力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确定了家庭暴力是联邦罪,属刑事重罪。对被起诉的施暴者,联邦调查局有责任跨州追缉。

2008年出版的《在施虐的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利用女性主义反暴力运动的》(*In an Abusive State; How Neoliberalism appropriated the Feminist Movement Against Sexual Violence*)一书则从根本上解构了这个成就,揭示出女性主义在反

对家庭暴力运动中和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联手进行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实质。这是一部重要著作,引起了女性主义内部巨大的反响。作者是阿默斯特学院政治学教授克里斯丁·巴米勒。

笔者很喜欢这本书,能在其中找到共鸣,这跟笔者的经历有关。在这里有必要费些笔墨讲讲我跟美国司法的遭遇。1993年是我很难忘的一年。我当时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女性学,5月份要参加博士资格考试。3月26日我被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警察逮捕,罪名是:对儿童造成一级危害。如果罪名属实,我将被判最长5年监禁,罚款4万美元,失去孩子的抚育权,孩子由国家负责安置收养家庭。

9岁的儿子因为放春假就跟我到学校来。当地大学和当地中小学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放假,从来不协调,所以如我这样一边上学一边教书一边做母亲的人,在孩子放假时只能把他带在身边。我当时在做助教,办公室在四楼,上课前去楼下的系办公室复印一些资料。儿子在我的办公室里闲得难受,就决定给411打个电话询问市里高中篮球联赛的事。办公室是分机,要先拨9才能打外线。不知怎么弄的就拨了911报警电话。学校警察根据电话找到我的办公室,就把他带走了。我复印回来,孩子已不见了,桌上一张纸条:请到警察局接孩子。我一进警察局就被告知,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任何你所说的话都可能被用来做法庭证词对你不利……你被逮捕了。接着就是被推来搡去地照相、按指纹。没有任何人给你机会解释,不管问什么问题,都只是一个回答:请找你的律师来谈。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做助教每月700美元的工资。律师一个小时的咨询费就要200美元,我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家庭律师”呢?

因为我是本校的学生,最后总算允许我跟儿子一起回家了,可能算是一种保释吧。后来才明白,俄亥俄州法律条文规定:14岁以下的孩子必须24小时有成人监护。警察在我的办公室里看到孩子一个人,就认定我不在场,所以认定我对孩子不负责任,对孩子的安全造成了一级伤害。我离开警察局时,一警察对我说,你不懂在

美国怎么做母亲。后来通过律师、学校、老师、朋友的帮助和两个多月的努力,哥伦比亚市法庭对我做了无罪判决。

马克思主义断言:任何法律都是为那个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都带着那个社会的阶级身份。保护儿童的法律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在立法上取得的伟大成绩之一,是为了惩罚对儿童的暴力的。当时我就认识到,过分强调社会性别而忽视阶级和种族,是女性主义参与立法的一个重要理论盲点。法律上要求对孩子的认真呵护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要成人 24 小时监护孩子,除了中产阶级和富人们,谁又能做得到呢?我一个月工资 700 美元,平均一小时不到 1 美元,怎么会有钱去雇 5 美元一小时的保姆呢?这里的逻辑就是:贫困本身就是违法。当然,在街道上,在学校的院子里,总会看到 14 岁以下的孩子自己玩,为什么这就不是问题呢?如果我是白人,警察见到一个白人的孩子,也会把他带走,也会马上想到在美国会不会做母亲的问题吗?有色人种对孩子不负责,这种偏见不正是种族歧视的一个方面吗?

再回到《在受虐待的国家里》这本书。巴米勒的结论是建立在大量的个案调查(包括查阅被强奸者的法庭证词)和检查法律程序,以及对家暴受害者的访谈之上的。她发现,女性主义所要求的社会性别利益经常与种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相抵触。即便是社会性别利益——女性的利益,国家机器也没有给予保障。女性主义和国家机器联手对待家庭暴力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暴力的受害者被国家通过社会福利部门监管控制起来,而施暴者,绝大多数是贫困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的尤其是黑人男性被监禁。通过推行反家庭暴力,女性主义帮助国家机器加重了种族暴力和阶级暴力。

我们从女性主义左翼的反思中感觉到了一种政治诚实: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敢于解剖自己,勇于自我批评。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同时我们也看到学者们跟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一种暧昧关系:霍姆斯特罗姆、佛里泽、爱森斯坦和巴米勒这 4 位学者不谋而合地把资本主义分成

“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或者说,她们把资本主义分成了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她们共同的基本叙述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在其中,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批判力量,而且她们的批判经常被制度接受采纳,所以就有了以改变社会两性不平等关系为己任的风起云涌的女性运动。但是,1970 年代后期国家资本主义被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替代。这种提倡高度个人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毁掉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功能。这种“坏的”资本主义成功地“引诱”了女性主义,使其放弃了改变社会的“良好初衷”。前阶段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纲领被资本“利用”来改革自己,使自身更强大。就这样,女性主义不知不觉地在“历史的狡诈”中,转向极端利己主义,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合上了拍子,成了资本主义的“侍女”。

首先,资本主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运作形式,它的本质和它的核心矛盾是不会变的: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扩张。不论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资本主义,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运作资本扩大和资本积累。阶级恶性对立、性别种族严重不平等、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暴力、对农民土地强取豪夺、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人性的无限异化、无安全感的心理痛苦,所有这些,发生在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怎么能有“好的”资本主义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位一般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学者,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在考虑自身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完完全全地缺乏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意义,就是对资本主义旗帜鲜明的革命性的批判。用葛兰西的概念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积极的革命”,女性主义左翼的批判充其量也只是“消极的革命”。

诚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尽管“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主要矛盾不变,社会中的次要矛盾和附属性矛盾会有不同。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女性主义的批判锋芒并没有指

向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本;而是指向前资本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父权和男权意识形态,这就是“社会性别”的基本功能。改变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女性主义在为建立纯然的资本主义秩序扫清障碍。女性主义的进步意义,对历史的推动意义就在于此。

父权制同资本主义有完全不同的逻辑,有很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个制度之上的各种道德伦理性关系。只要获得利润为基础的动能保证继续运作,资本主义就可以汲取各种建议,实验不同的制度。在资本逻辑面前,男女、种族、性倾向,所有制约各种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只能是资本发展的障碍。当然,资本也会利用父权制实现最大利润:包括雇佣女工来降低整体工人工资;女性为主的无偿家务劳动使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再生产更便宜等。但是整体来说,资本主义体系相比起前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宽宏大量”的,只要不干涉其资本利润最大化,不试图推翻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主义几乎什么都可以包容。女人可以做财政部长,黑人可以做美国总统,同性恋者可以被选为州长议员,前提是只要他们维护资本这个核心利益。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相比,应该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形式,更体现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精神,更接近资本主义的本质。女性主义抗击父权意识形态的斗争基本完结,女人可以打破玻璃天花板,因此她也失去了批判的目标。女性主义左翼学者都把这个阶段的女性主义描述成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姑娘,轻易地被新自由主义诱惑,其主体性全然消失,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而实际上,女性主义的主体性一直在积极地运作,女性主义的主体就是资本主义的主体,在任何资本主义的形态,女性主义都忠实地按照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运作,追求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由于父权制的被削弱,女性主义从一种进步的运动变成了符合时代精神的保守势力了。

2013年10月,美国的“全国女性解放组织”(The National Women's Liberation)在纽约市组织了一个以纪念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为主题的特殊会。费尔斯通是这个也称为“红袜子”(Red Stockings)的激进女性组织的发起人^①。她的代表作《性别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 1970)国内可能有译本,是1970年代的革命女性必读书。她所领导的连续两年(1968、1969)的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运动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标志性的开始。费尔斯通是一个寓言式的人物。这位激进马克思主义女性运动的先锋,后来精神分裂,于2012年8月孤独地死在纽约公寓里,身边只有一只猫。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特殊的会议。我跟这个组织未曾有过联系。收到的会议通知没有会议地点,要求对会议保密。开会的那天,我根据指示到了纽约市切尔西区的一个街口,向一个等在那里的男士出示会议标志,然后跟着他左绕右绕来到一个居民社区的活动中心,这就是会场。为什么是秘密的呢?参会者大多属于反资本的工会组织、劳工运动和女工组织,很多人都收到过死亡威胁信,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上的。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做革命者的感觉,有了江姐的感觉。“找回我们激进的传统,抗击资本主义,激活革命的女性解放运动”。这个挂在墙上的会议标题尤其令人注目,充满期许,用的是一本书的名字《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作者是领导无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未完待续)。

注释:

① “红袜子”是从20世纪30年代伦敦的一些资产阶级女性的一个组织“兰袜子”而来。“红袜子”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女性的组织,所以把颜色改为红色,红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颜色。

参考文献:

- [1] 柏棣. 满足欲望,自我选择——西方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J]. 妇女研究论丛, 2008, (2).
- [2] Nancy Fraser. *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 - and how to reclaim it* [N]. *The Guardian*, 2013 - 10 - 13.